

上海



上海市社会科学博士文库

(下册)

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

梅新林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

上海市社会科学博士文库

(下册)

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

梅新林 著

【第七辑】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梅新林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10

(上海市社会科学博士文库)

ISBN 7-309-05072-X

I. 中… II. 梅… III. ①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②历史地理-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I206.2②K928.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75193号

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上、下册)

梅新林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18853(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宋文涛

总编辑 高若海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3.25 插页 2

字数 804千

版次 2006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7-309-05072-X/1·359

定价 65.00元(全二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四章 文人流向与文学地理

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版图而言,流域轴线是其“动脉”,城市轴心是其“心脏”,文人群体则是其“灵魂”。作为文学活动与创作的主体,文人群体流向随时改变着而且最终决定着古代文学版图的整体格局。

文人群体之所以总是处于不停的流动之中,是因为其必须经历不同的人生阶段,因而导致不同的地域流向。根据文人普遍的人生道路,主要有求学、应举、仕进、流贬、授业、隐逸、游历、迁居等八个关键环节,由此决定了文人群体的角色转换与地域流向。概言之,一是由八个关键环节分别构成文人群体流向的三种形态,即求学、应举、仕进、授业主要表现为向心型的地域流向,是以向心力为动力的正向运动;隐逸、流贬主要表现为离心型的地域流向,是以离心力为动力的逆向运动;游历、迁居则主要表现为交互型的地域流向,是以向心—离心力为合成动力的交互运动。在此三重动力中,向心力为主导性动力,离心力为辅助性动力,而向心—离心力的合成动力则为平衡性动力。二是从八个环节到三种形态,体现了必然性与或然性、绝对性与相对性、有序性与无序性的矛盾统一。求学是所有文人的必经之途,也是导致所有文人向心型地域流向的始点与基点,可以说是一种必然性的人生阶段。然后从应举、仕进、流贬、授业、隐逸到游历、迁居等,则为多数文人所全部或部分经历,彼此的地域流向也各不相同,则是一种或然性的人生选

择。而就绝对性与相对性的关系而言,应举——无论是隋代以前的荐举,还是其后的科举,都毫无例外地是从地方到中央的选拔赛与淘汰赛,在向心型的地域流向中最具典范意义,求学于官学系统者也是如此。而隐逸、流贬则正好与此相反,尤其是流贬,由其构成的离心型的地域流向较之隐逸更具典范意义。至于有序性与无序性的关系,大体而言,八个环节、三种形态都是有序与无序同时并存;具体而言,由游历、迁居构成的交互型地域流向较之其他六个环节、两种形态更显无序性特点。三是从八个环节到三种形态的必然性与或然性、绝对性与相对性、有序性与无序性的矛盾统一,并未在根本上影响与改变文人群体流向“外邑→都城、边缘→中心”的总体趋势。诚然,每个文人个体都有自己的独特经历,这种独特的经历是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然而当无数个文人个体汇合成文人群体的整体地域流向时,那么,其中便有共通的轨迹与规律可寻。正如由小溪汇成江河最后流入大海,从文人个体到群体的整体地域流向,总是围绕不同级次、不断转移的城市轴心,并以流域轴线为主要通道,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小城流向大城,从大城流向都城。四是文人群体流向的三种形态,以正一反一合的内在于结构与运动方式,表现为整体性与局部性、主导性与辅助性、统一性与多元性的交融整合,同时在极化—扩散的对流与互动中,不断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频繁流动中的文人群体也因此而历经不同的排列组合,然后逐步成长为不同的文学社团与文学流派。

第一节 城市文学轴心与 文人群体流向

河流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城市是人类文明的象征,人类对于城

市文明的向往是与生俱来、历久不衰的。诞生于农业文明土壤之上的中国古代文人也不例外，他们的人生理想与人生道路决定了他们不由自主地从乡村走向城市，从小城走向大城，从大城走向京都，与整个城市轴心体系级次趋势基本一致而不是相反。城市对于文人群体来说，既有外在的物质文明的吸引，又有内在的文化心理的认同，其中处于城市轴心最高级次的都城更具超越于一般城市的多重象征意义。

一、“京都情结”与文人群体流向

文人群体对于城市轴心的心理向度是随城市级次的依次提升而逐步增强的，最终至都城而达于极点。对此，我们不妨以“京都情结”名之。这种“京都情结”一方面是由城市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引力所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是由都城的悠久文化传统积淀和升华而成的。

首先，是卓异的京都景观强烈吸引着天下文人向京都云集。历代京都无不选择在地势险要、风景优美的“风水宝地”之中，无论其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皆非其他城市之可及，因而成为历代文人群体的向往之地。东汉时期，著名文学家兼史学家班固、张衡先后游观西都长安与东都洛阳，然后写下千古名篇《两都赋》与《二京赋》，从作者铺张扬厉的夸饰性描写中，我们不难想见当年班固与张衡游历长安、洛阳时难以抑制的激动之情。同样，我们也可从古代大量描写京都的诗歌、辞赋、散文以及小说等作品中推测作者近似班、张的情感冲动。

其次，是广阔的京都舞台强力吸引天下文人向京都云集。京都为皇宫所在，是文人士子显露才华、施展抱负、成就功名的理想舞台。从隋唐之前的荐举到隋唐之后的科举，为文人群体提供了通过相对平等竞争走上仕途的际遇与舞台。千载之下，我们犹能

真切地感受到当时文人士子科举及第后的荣耀与满足。然而荣耀也罢,满足也罢,对于文人士子来说,科举及第仅仅意味着迈入仕途之门,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仕途的努力,实现兼济天下、成就功名之人生理想。而要最大限度地实现这一人生理想,又必须跻身于京官行列,而且要居于京官要职。

从先秦到清代,中央职官制度变中有承,承中有变,上一章我们已对唐代中央官署设置作了简要的分析,其主体在三省、六部。隋唐以至清代,三省屡有变化,而六部则一直相沿未改。各代中央官制职数有限。兹以明代为样本,明代六部之上设内阁大学士,又有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三孤(少师、少傅、少保)。此外,又有都察院、翰林院、国子监、六科、二十四衙门等职官,以及总督、总理、巡抚等朝廷特派官员。据《明史·职官志》载,明代后期三公三孤及六部官员总额为112—292人;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翰林院、国子监官员总额为126—200人;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尚宝司、六科、中书科、行人司、钦天监、太医院、上林苑、五城兵马司、僧道录司,共261—587人;另有宦官173—182人,女官93人。总计765—1168人^①。除去其中的特类宦官与女官,则为499—893人。对于成千上万的异常庞大的文人群体而言,若要跻身于这499—893人的京官行列之中,的确并非一件易事。据大略统计,有明一代科举及第者为24814人,而至京都应举的文人士子数量当然比这个数目还要多得多。其中应举及第者已是大幸,则及第之后而又位居要职尤其是京官中的要职更是凤毛麟角。

诚然,古代的确也有少数文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机遇,步步高升,甚至出将入相,功名成就,这就极大地刺激了文人士子的从政热情与荣升幻想。而且,在其他诸路都出现障碍的情况下,最后留

^① 参见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五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1—22页。

给文人士子还有直接上书自荐一途。比如西汉建元二年(前 139)东方朔上书自荐,次年为太中大夫给事中。建元四年(前 137),枚乘子枚皋时年十七岁,上书武帝,自称枚乘子,武帝大喜,拜为郎。又,唐武则天光宅元年(684),陈子昂二十四岁,游东都洛阳,献书阙下,武后爱其才,召对金华殿,拜麟台正字,由是海内词人靡然向风,乃谓司马相如、扬子云复起于岷峨之间。这些都是文人上书自荐成功的实例,而且对文人士子也同样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再次,是悠久的京都文化强力吸引天下文人向京都云集。尤其是屡经易代仍长期作为京都的长安、洛阳、建康等,本身即是文化传承的象征、历史兴衰的见证,文人对此往往别有一种经过价值内化的文化认同感与精神契合感,我们不妨称之为“京都情结”。“情结”(complex)本是一个心理学概念,经历了从医学专业到日常生活、从精神病例到艺术创作、从个人无意识到集体无意识、从童年创伤到种族记忆的扩张与延伸,是一种包括意识、个体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在内的心理机制与能量^①。所谓“京都情结”,即是指与此相似的一种心理机制与能量。也同样经由意识到无意识,由个体无意识到集体无意识而趋于价值内化与升华。

当然,文人的“京都情结”表现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心理趋求的同时,其内涵也是丰富多彩的,并因时因人而发生变化。其一是对京都的崇尚。这在源远流长的都城赋中得到了比较集中的表现。首篇都城赋为西汉扬雄的《蜀都赋》,因秦代张仪仿秦都咸阳营建蜀都,故于《蜀都赋》中可以映照秦都咸阳的原貌。扬雄之前,西汉另一来自四川的大赋家司马相如曾写过多篇宫苑赋,但宫苑赋多限于描写特定的宫苑,并非对都城的全面描写。都城赋的特点是以铺张扬厉的手法对都城进行全方位的夸饰性描写,并在夸饰性

^① 参见霍尔等《荣格心理学入门》,三联书店,1987年,第35—38页。

的描写中表达对于都城的崇尚、向慕之情。就这一对京都的情感取向而言,我们还可以依次上溯至《战国策》对于临淄等诸侯国都城的夸饰性描写,以及《诗经·颂》中《绵》、《文王有声》等有关公刘与文王、武王营建新都的描写以及对其功德的歌颂,此虽与后代都城赋在文体及繁简方面有所不同,但情感取向是一致的。由西汉扬雄的《蜀都赋》,至东汉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魏刘劭的《赵都赋》、《许都赋》、《洛都赋》,晋左思的《三都赋》,宋代周邦彦的《汴都赋》,元代黄文仲的《大都赋》,明代余光的《北京赋》等等,这些都城赋多以夸饰性描写为特点,也多在夸饰性描写中表达了对于都城的崇尚、向慕之情。

其二是对京都的怀恋。这在源远流长的都城记中得到了比较集中的表现。怀恋与崇尚并无截然的分野,当对都城崇尚之情转化为今昔之间的情感追忆时,便由崇尚转为怀恋,因而与上文提到的《战国策》对于临淄等诸侯国都城繁华的描写不仅在文体上一脉相承,同时在情感上也有内在的联系,再由此溯其源,还可以上溯至《诗经·王风》之《黍离》,诗中写一位来自东周首都洛阳的远行者经过西周首都镐京,见城中宗庙宫室遗址,黍稷离离,压抑不住内心的忧伤而作“黍离”之叹。应该说,此诗的情感基调是感伤,但作者在以今天之衰对比昔日之盛时,实也寄托着某种怀恋之情。真正于都城记中寄托对都城怀恋之情的经典之作有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以及明代张岱《西湖梦寻》等等,以“梦”或“旧事”为题,标明皆为追忆之言,寄托怀恋之情。《东京梦华录序》写北宋东京之繁华: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

陌花衢，接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①

实与都城赋的夸饰性描写如出一辙，由此可见彼此的相互影响，相互借鉴。但都城记多为追忆之言，故而主题不是崇尚，而是怀恋。既是怀恋昔日之“梦”，便不能不将昔日之“梦”虚化、美化和诗化，同时也不能不触及对现实的感伤。吴自牧《梦粱录序》云：“昔人卧一炊顷，而平生事业历历皆遍，及觉则依然故吾，始知其为梦也，因谓之黄粱梦。矧时异事殊，城池苑囿之富，风俗人物之盛，焉保其常如畴昔哉？缅怀往事，殆犹梦也，名曰《梦粱录》云。”又张岱《西湖梦寻自序》亦云：“余生不辰，阔别西湖二十八载，然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而梦中之西湖，未尝一日别余也。”^②

其三是对京都的感伤。这在都城诗中得到了比较集中的表现。其正源出自于上文已经提到的《诗经·王风》之《黍离》，作者“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的情感抒发，其情感基调是忧伤，较之一般的感伤更为强烈。再至屈原的《哀郢》：“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心结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登大坟而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则进而由忧伤趋于忧愤，可见感伤的情感也同样是丰富多彩的。以都城赋、记、诗比较，当以都城诗为数最多，其中又以唐诗感伤之作最具典型意义。从初唐卢照邻《长安古意》、骆宾王《帝京篇》，盛唐李白《金陵三首》、

① 《东京梦华录》，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1页。

② 张岱《陶庵梦忆》与《西湖梦寻》之合刊本，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171页。

《登金陵凤凰台》，中唐刘禹锡《金陵五题》、《金陵怀古》、《西塞山怀古》，杜牧《泊秦淮》，李商隐《南朝》，许浑《金陵怀古》，直到晚唐五代韩偓《故都》，韦庄《长安旧里》、《台城》等等，都是以感伤为情感基调，其中刘禹锡的七绝《金陵五题》其一《石头城》、其二《乌衣巷》，七律《西塞山怀古》都堪称都城诗怀古感伤的经典名篇。

由京都悠久文化传统孕育崇尚、怀恋、感伤三重情感，然后积淀和升华为超越个体、超越时代的京都情结。历代不同的文人群体都是在此“京都情结”的驱使下，纷纷云集京都，并从中获得一种精神满足。

二、文人群体流向的趋势、动力与图式

在城市轴心体系中，都城处于核心地位，从京都景观、京都舞台到京都情结，由外而内，就如一个巨大的磁场强力吸纳文人群体从四面八方聚集京都。因而就文人群体流向的总体趋势观之，是从外邑流向都城，由边缘流向中心。但同时又表现为整体性与局部性、主导性与辅助性、统一性与多元性的交融整合。概而言之，文人群体流向可以归结为向心型、离心型与交互型三种形态，彼此以“正一反一合”的内在结构与运动方式，呈现为不同的趋势、动力与图式。

(1) 向心型的文人群体流向。重点体现在求学、应举、仕进、授业四个关键环节中，四者以求学为始点，然后依据文人通常的人生道路，由求学而应举而仕进或授业。求学、应举、仕进、授业在总体上呈现为文人群体的从外邑到京都、从边缘到中心的地域流向，但彼此又有一定的差异。求学是所有文人的必经之途，求学于官学、私学、书院的不同系统而呈不同的地域流向。官学系统以中央太学为最高学府，同时根据从中央到地方，从都城到外邑，按不同城市级次设置不同级别的学官与学校，此由中央官学到地方官学的城市分布正与城市轴心体系的地域分布相吻合，因而也能最充

分地体现文人群体的从外邑到京都,从边缘到中心的地域流向。相比之下,私学与书院系统分布比较散乱,因而求学于私学与书院地域流向也较官学游离不定。应举是文人从求学到入仕的人生转折点,无论是隋代以前的荐举,还是其后的科举,都是一种从地方到中央的选拔赛与淘汰赛,最具从外邑到都城、从边缘到中心地域流向的典范意义。由应举到仕进,标志着文人正式开始走向仕途。在通常的情况下,文人在中举之后,先是外任为地方官员,然后伴随从低职向高职的升迁而成为京官,在地域流向上即是从地方流向中央,从边缘流向中心。当然,其中也有交叉、反复乃至逆向的情况,比如京官外任地方要职,从仕途上看,是从低职趋于高职,但在地域流向上,则是从京都流向外邑。但就总体趋势而言,呈现为向心型的地域流向。授业既与仕进相分合,在官学中,彼此合而为一;而在私学与书院中,彼此则由合而分。又与求学相对应,同样以官学最充分地体现了文人群体的从外邑到京都、从边缘到中心的地域流向。又,授业与求学同为人生两大关键环节,当其在师生两代之间构成授受关系时,便在彼此的薪火传递中实现了代际循环与文化延续。

(2) 离心型的文人群体流向。重点体现在隐逸与贬流两个关键环节中,所不同的是,隐逸属于主动行为,而流贬则是被迫所致;隐逸出于隐逸者的个人选择,或其故里,或名山大泽,或干脆“大隐隐于市”,在地域流向上往往因人因时而异,而贬流则被强制性地置于特定的地域之中,多在西北、东北、西南的偏远之地。其中,贬流之间的地域流向又有明显的区别,贬谪属于降职处分,仍担任一官职务,还有量移内地的可能,而流放则已被削籍为民,而归之于罪犯,故而惩罚又重,流放之地也比贬谪之地更为偏远。但就地域流向而言,无论是隐逸还是流贬,都呈离心型的逆向运动,都是从京都流向外邑,从中心流向边缘。

(3) 交互型的文人群体流向。重点体现在隐逸与流贬两个关键环节中。既不同于求学、应举、仕进、授业的向心型,也不同于隐逸、流贬的离心型,游历与迁居主要表现为“向心—离心”两相复合并不断转换的交互型地域流向,表现为“正—反—合”的内在结构与运动方式。与此同时,游历与迁居本身不仅存在着流动性与稳定性、暂时性与长期性的差异,而且带有更多的个人动机与行为方式,因而在地域流向上的变数大于常数,更多的是在外邑—京都、边缘—中心与京都—外邑、中心—边缘之间交互展开。但从整体上看,历代文人群体的迁居流向是与城市轴心体系的级次序列相一致的,且伴随城市轴心的转移而转移。相比之下,游历更具因人因时而异的相对性、或然性与无序性特点,但同样地,在因人因时而异的相对性、或然性与无序性中又隐约显示出了从外邑流向京都、从边缘流向中心的总体趋势。

从驱使以上三种类型地域流向的动力学上追溯,那么由求学、应举、仕进、授业构成的向心型文人群体流向,主要由向心力所驱动,表现为外邑—京都、边缘—中心的正向运动,由隐逸、流贬构成的离心型文人群体流向,主要由离心力所驱动,表现为京都—外邑、中心—边缘的反向运动,由游历与迁居构成的交互型文人群体流向,则主要由向心—离心力交互合力所驱动,表现为京都—外邑、中心—边缘与外邑→京都、边缘→中心的交互运动。其中向心力为主导性动力,离心力为辅助性动力,向心—离心力交互合力为平衡性动力。主导性动力是最为重要、起决定性作用的核心动力,从根本上决定了文人群体从外邑趋于京都,从边缘趋于中心的整体流向。但隐逸与流贬构成的离心力虽然只起辅助、补充作用,但这种辅助、补充作用并非不重要,它可以从反向补正通过向心力不断从外邑到京都、从边缘到中心的极化运动,而使文人群体的分布更为均衡与合理。尤其是流贬文人,当其投身边地荒漠,便将文化

与文学资源从京都带向外邑,从中心带向边缘,从而有力地促进了边地文学与文化的开发与发展,他们是以自己沉重的生命代价从事于文化与文学的“拓边”事业。

以上以都城为核心的正反向动力直接导致形成“极化—扩散”的互动态势。“极化”与“扩散”本是经济学的概念,是指“经济开发活动地域过程中两个最基本的侧面,也是区位势能作用机制的集中表现。所谓极化,是指经济活动向某一具有区域优势的地点集聚,并逐步成为整个地域范围的发展极核的现象;所谓扩散,是指经济活动及其要素逐步由极核区域向外围扩散渗透,形成离心运动。在极化和扩散的机制作用下,随着区域经济发展的均衡与非均衡的矛盾运动,经济开发的地域过程表现出方向性的阶段递进。从极化和扩散的关系来划分,经济开发的地域过程大致可分为离散、极化、扩散、成熟四个阶段”^①(见图 4-1)。

这四个阶段与文人群体流向规律有相通之处。因为在以上文人群体流向的三种不同形态中,也同样存在着由外到内与从内到外的正向动力,即向心力与反向动力即离心力的双向互动作用,然后以都城为核心,向外迁徙,不断出现极化→扩散→极化→扩散的循环运动。再对应于图 4-1 所示的四个阶段,则离散阶段可以理解为未曾极化相对均衡的自然分布模式,然后在京都引力的强力吸引下,文人群体逐步向京都云集,然后又因京都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文人群体聚集京都的速度不断加快,最终形成增长极核,至此,即表明文人群体流向进入了极化阶段。然而京都容量毕竟有一定限度,到文人群体不断且加速云集京都而又趋于饱和状态时,则一方面会出现由外向内聚集速度、规模的减弱,另一方面会出现由内向外的扩散现象。这种现象在历代各朝营建新都或迁都的过

^① 叶忠海《人才地理学概论》,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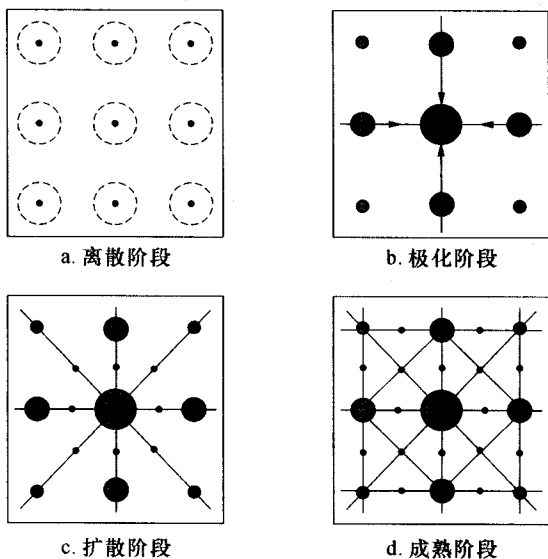


图 4-1 经济开发地域过程示意图

程中都已充分展现,从一定意义上说,建立新都或迁都即是打破旧有的文人群体聚集京都的极化状态,然后在不断累积与快速增长中重新趋于极化状态,在达到一定极化状态后,文人群体又会从京都“外溢”到附近地区,比如西汉、唐建都长安,东汉、魏、西晋建都洛阳,东晋南朝、明建都南京,元、明、清建都北京,一方面因文人群体的向京都云集出现极化现象,另一方面则又都曾在趋于极化阶段之后向京都附近如长安的三辅、洛阳的三河、南京的江南、北京的燕京地区扩散,形成以都城为中心、以诸多亚中心环拱的空间分布态势。然后又通过四大流域轴线等交通动脉,依次从亚中心不断传递给更次级的中心,形成轴、点、面扩散的趋向,京都附近空间分布则多环绕京都核心,呈相对均衡状态。如此,便由扩散阶段进入成熟阶段,亦即既不同于极化阶段也不同于扩散阶段的相

对均衡阶段。就此而论,以上所论文人群体流向的八种方式、四对关系中,从中心趋于边缘的隐逸与流贬对于打破文人群体流向的极化格局,然后通过由内而外的扩散而达于相对均衡状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二节 向心型的文人群体流向

由求学、应举、任职、授业构成的向心型文人群体流向,主要由向心力所驱动,表现为外邑→京都、边缘→中心的正向运动,在向心型、离心型、向心—离心交互型文人群体流向三种形态中占据主导地位,发挥主导作用。在“极化—扩散”的循环运动图式中,向心型文人群体流向因向心力的巨大作用,持续不断地从外邑向京都、从边缘向中心内聚而趋于极化状态。

一、求学与向心型文人群体流向

求学是文人入仕的准备阶段,也是文人开始接受文学教育然后进入文学家行列的奠基阶段。毫无疑问,受业者不可能全部成为文学家,但文学家没有不经过求学这一知识学习和积累阶段的,而且许多著名文学家求学阶段即已初显文学才华,为其日后顺利地踏入文学创作领域进而成为著名的文学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古代文人“读书—科举—入仕”的既定人生道路上,求学成为文人群体流动的始点。假如一个人经历从蒙学到县学再到郡学,最后赴中央太学,那么,他在地域流向上便因此完成了从乡村到城市、从城市到京都的求学之旅,其求学历程也就具有文人群体从外邑到都城、从边缘到中心的地域流向之典范意义。

中国古代教育大致可以分为官学、私学与书院三大类型。在

时间上,官学纵贯古今,未尝中断;私学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然后经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延续与发展,唐代之后逐步趋于衰落,而为书院所取代。在空间上,官学以京都最高学府太学为中心,然后根据行政级次依次逐级向地方官学延伸,由此构成了从乡村到城市、由城市到京都的固定有序的地域流向,与以都城为核心的城市轴心体系的级次序列几乎完全重合。相对而言,私学主要不是根据行政建制体系确立学校等级序列,而是往往以私学场所或名师所在为地域中心,然后由各地求学者向此汇集,或都市或乡村,或固定或流动,显然比官学更具自由性与分散性的特点。但私学同样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私学的繁荣离不开特定区域的文化生态环境。因此,从总体上看,私学也同样集中于文化比较发达的区域中心城市,甚至也有不少处于都城之中。书院多处于山林名胜,远离喧嚣的都市,因而与官学的地域流向差异最大,但透过书院的地域分布,我们也同样可以发现其中与区域文化发展的密切关系,并随着区域文化重心的转移而转移。

官学、私学、书院作为古代文人群体授业与求学途径中的三大地域流向,彼此既有不同的地域重心与边界,同时又呈相互呼应的总体趋势。

(一) 求学于官学的文人群体流向

与远古时代的政教合一、官师合一相对应,最初的受业者也多为贵族子弟。在教育为王室贵族所垄断的情况下,少量的学校重点分布于都城之中,然后随着中央官学向地方官学的延伸,并按行政区划建立相应的学校机构。至此,求学者的队伍才能容纳贵族子弟之外的更广泛的阶层,其地域分布也逐步从集中于都城向各级政区城市扩展。

古代文人有着悠久的远游异地、从师求学的游学传统,商代甲骨文已有方国学子求学于商都的记载,卜辞云:“丁酉卜,其呼以